

伊斯兰文化视野中的吐蕃人文社会

——8-16 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的吐蕃

杨 铭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公元 8-16 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吐蕃之前,阿拉伯、波斯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各种记载。这一时期记载吐蕃的阿拉伯、波斯文献有十余种之多,这些文献的作者均有伊斯兰文化背景,但其中到过吐蕃的仅为少数。根据考证,这些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描述大部分可信,但仍有部分误传或误记的地方,反映了伊斯兰文化与吐蕃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关键词: 吐蕃; 伊斯兰; 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08)04-0019-05

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文化与吐蕃文化几乎同时兴盛起来,13 世纪伊斯兰的影响已推进到青藏高原的四缘,伊斯兰文化不可避免地吐蕃文化发生互动。14 世纪以后,伊斯兰教首先从克什米尔传入吐蕃。

有关伊斯兰文化与吐蕃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涉及不多,即使有也侧重于近代以来的现状^[1]。本文考察的是从公元 8 世纪开始直到 16 世纪,即西方传教士进入吐蕃之前,有着伊斯兰文化背景的阿拉伯、波斯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记述,以期揭示伊斯兰文化与吐蕃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一、16 世纪前阿拉伯、波斯与吐蕃的交往及文献概述

公元 7 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势力已经逐步控制了中亚,影响开始到达唐朝,其标志就是《通典》记载:“大食,大唐永徽中(650-655 年),遣使朝贡云。其国在波斯之西。”“大食”为波斯文 *tazi* 的音译,原系一波斯部族的名称。后因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唐代史书遂称东进的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古藏文拼为 *ta zig*,或更加藏语化而写作 *stag gzig*。不过,藏语中的这个词,不是直接来自波斯语

而是转译自中亚的粟特语(*sogdian*)^{[2](P2)},即是吐蕃通过与中亚康国的接触而得知 *tazi* 这个词的。

公元 8 世纪初,“白衣大食”(哈里发王朝,660-749 年)的军队在其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率领下,攻占了今楚河以南、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并有继续向东推进的势头。而这一时期,吐蕃正在经略克什米尔及帕米尔地区,以图攻夺唐朝的安西四镇。大食欲东进,吐蕃欲向西域发展,其目标是相同的,因而出现了双方联合的情况。据阿拉伯史书的记载,公元 704 年,白衣大食发生了穆沙(*musa*)叛乱,地点在今中亚的捷尔梅兹(*tirmidh*),吐蕃与突厥等曾前去协助镇压^{[3](P33)}。公元 715 年,则发生了吐蕃与大食军队联合进攻拔汗那的事件。拔汗那在汉代称“大宛”,《魏书》称“破洛那”,《隋书》作“沛汗”,新、旧《唐书》均作拔汗那,即今中亚之费尔干纳(*farghana*)。唐高宗显庆三年(658 年),封其国为休循州,以王为刺史。玄宗开元三年(715 年),吐蕃与大食另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发兵攻其城,“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其时,正适唐监察御史张孝嵩在安西视察,遂发都府戍兵及羁縻州士兵万余人出龟兹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败阿了达于连城下,孝嵩等勒石记功而还^[4]。

紧接两年后,又发生了吐蕃、大食联合谋夺四

[收稿日期] 2008-05-08

[作者简介] 杨铭(1952-),男,重庆江津人,现为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民族文物。

镇的事件。开元五年(717年),安西大都护汤嘉惠上奏朝廷,称“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9]。突骑施原为西突厥之一部,强盛于唐武后年间,建牙帐于碎叶川,其首领为苏禄,他曾娶吐蕃公主为妻。钵换、大石城,分别为今新疆之阿克苏与乌什。此次吐蕃与大食的联合行动,由于唐朝安西大都护的迅速反击而再度失败。

其后,阿拉伯史学家雅库比写道,在奥马尔二世统治时期(717-720年),吐蕃曾派出一个使团,到大食的呼罗珊总督加拉赫处进行活动,还要求派一位穆斯林教师到吐蕃去。据说派去的这位教师名叫“沙利特”,他显然是到拉萨去处理有关伊斯兰教事务的^{[9](P33)}。波斯文古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也说,拉萨“有许多偶像寺(佛寺?)和一个清真寺,其中住着一些穆斯林”^{[7](P64)}。唐代是否已经有伊斯兰教传入吐蕃,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尚不能确定,这主要是因为藏文资料中没有相关的记载,因而早期阿拉伯地理文献的记载无法印证。但唐代吐蕃与大食有过接触与交往,这是没有疑问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的732年条记载,“大食与突骑施之使者,均前来赞普王廷致礼。”^{[9](P115)}在今拉达克德兰茨村发现的粟特石刻铭文曰:“二百一十年,来自撒马尔罕(samarkander)的诺斯凡作为大使,致礼吐蕃可汗(khagan)。”据研究,这件铭文的年代,当在公元825年4月24日至826年4月12日之间,它反映了9世纪上半叶,吐蕃与康国交使的情况^{[9](P406)}。

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前哈里发王朝,这个王朝时期(750-1055年)的阿拉伯帝国在汉文史书中被称作“黑衣大食”。天宝十载(751年),大食军队在怛逻斯击败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所率的军队,自此之后唐朝在中亚的势力开始退缩。天宝十四载(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在此后约三十年中,相继攻占陇右、河西及西域东南部的一些地方,遂出现了与回纥、大食争夺西域的局面。

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唐润州节度使韩滉至长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众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10]《通鉴》卷二三三引李泌之言更详:“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唐朝欲招结大食以抗吐蕃,后来终无结果。但我们能从唐人所言中,见到吐蕃与大食对抗的事实。前引《新唐书·南蛮传》所载的贞元十七年(801年)西川一战,被唐

军俘获的人众中,就有“黑衣大食等兵”,他们当是在吐蕃与大食的战争中,被掳掠至吐蕃东线的。

雅库比还写道,公元809年,河中发生了由拉飞·伊本·来斯(rafi ibn layth)发动的暴乱,他利用昭武九姓人对大食统治的不满,在突厥人的支持下,率领群众杀死大食官吏,完全控制了该地区。当时,九姓乌古斯人、葛逻禄人及吐蕃人都给拉飞派来了援军^{[11](P35)}。这个事件再一次证明,从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吐蕃与大食是尖锐对立的。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所建著名的唐蕃会盟碑记载:“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喧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12](P45)}尽管有些言过其辞,但从这段碑文也能间接看出吐蕃与大食双方“争胜于疆场”的对立关系。

到9世纪30年代,波斯人建立了独立的伊斯兰王朝——塔赫尔王朝,取代了阿拉伯人对中亚的统治。40年代末,吐蕃内部因灭佛与护佛而发生战乱,河陇及西域等地复归于唐。自是,吐蕃与大食都脱离了中亚,双方的交往也就告一段落。此后,有关吐蕃故地与穆斯林交往的记载很少。11世纪初,吐蕃西部的古格国王意希沃带兵到阿里以北的葛逻禄活动地带去筹集黄金,以作为邀请印度高僧入藏弘法的聘金。结果被葛逻禄国王抓住,他强迫意希沃改信伊斯兰教,意希沃没有答应,结果死在狱中。

从11世纪开始,伊斯兰教逐渐在吐蕃北面的新疆、西部的克什米尔和南面的印度传播开来,对吐蕃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但吐蕃凭借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得以置之身外。其间,有一些印度佛教僧人为逃避伊斯兰教的而来到吐蕃,他们将掺有伊斯兰教成分的时轮但特罗也传入了吐蕃^[13]。

有明确记载的伊斯兰教首次传入吐蕃已经到了14、15世纪之交。当时,原来属于吐蕃控制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和拉达克(Ladakh)先后被伊斯兰化,这样伊斯兰文化就不可避免的传到了吐蕃。当时,来到吐蕃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已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宗教社团,藏语称呼他们叫“卡契(Ka che)”,这也是藏人对克什米尔的称呼。从此,穆斯林开始在吐蕃各地安家落户,到了14和15世纪之交,仅拉萨的穆斯林至少已达一万多人^[13]。

由于有上述历史背景,所以从公元8世纪以来,在阿拉伯和波斯史学家、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开始有了关于吐蕃的记载,而几乎无一例外,这些著作的作者均有其伊斯兰文化背景。据笔者初步的搜集和鉴别,这一时期记载吐蕃的阿拉伯、波斯文献有十数种之多,按年代顺序排列是:

[阿拉伯文]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初稿完成于 846 年左右；

[阿拉伯文] 雅库比《阿巴斯人史》“中国诸王”，成书于 875 年或 880 年前后；

[阿拉伯文] 佚名《中国印度见闻录》，写于 9 世纪中叶到 10 世纪初；

[阿拉伯文] 伊本·罗斯特《珍宝志》，约成书于 903 年；

[阿拉伯文] 伊斯塔赫《各国道路记》，约成书于 930-933 年；

[阿拉伯文] 马苏第（？-956 年）《黄金草原》；

[阿拉伯文] 佚名《世界境域志》，约成书于 10 世纪下半叶；

[阿拉伯文] 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成书于 10 世纪；

[阿拉伯文] 伊本·巴伊塔尔（1197?—1248），《药草志》；

[阿拉伯文] 雅库特《地名辞典》，约成书于 1228 年；

[波斯文] 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成书于 13 世纪；

[波斯文] 拉施特主编《史集》，成本于 14 世纪；

[阿拉伯文] 伊本·白图泰（1303-1377），《伊本·白图泰游记》；

[阿拉伯文] 阿克伯·契达伊《中国志》，约成书于 16 世纪初；

[波斯文] 米儿咱·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成书于 16 世纪。

以上 15 种文献及其作者，其背景毫无疑问均属于伊斯兰文化的，但据我对这些文献的研读发现，其中真正到过吐蕃的作者不过一二人，而后的代表就是《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海答儿”。

根据《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当时的克什米尔征服者米儿咱·海答儿曾经率领军队进攻吐蕃，不过在距离拉萨还有数日里程的时候，他就打道回府了，具体情况如下：米儿咱·海答儿率领远征军离开列城的日期是公元 1533 年 7 月 4 日或前后不久，到达阿斯喀布拉克（Askabrak）的日期是 10 月 22 日；从那里退却是 10 月 28 日；到达接近瓜查岭边境的塔姆里克（Tamlik）时是 1534 年的 1 月 10 日。根据他的叙述来看，他从玛域（列城或其紧邻地区）出发；在进向 Askabrak 路上一共经过了 4 个地点：首先是 barmang（或作 Yarmang, Bartang 等，此地异名很多）；第二是 Kradun，第三是 Luk Liuk（或作 Tuk u Labuk，或 Luk Lanuk），该湖滨城堡刚好位于列城去拉萨的中间站；第四是 Ham（或

Hari），离这中间站有两天路程；最后抵达 Askabrak，他估计该地距拉萨约有 8 天路程。在那里他停留了 6 天，然后经过 8 天时间回到了他所说的塔姆里克地方，此地距瓜查岭（Gugeh）只有不到两天的路程，而距玛域或列城则有 20 日程。但至今为止，对米儿咱·海答儿提到的他经过的这些吐蕃地名的比对，还不是很清楚，为此笔者将另撰文加以讨论。

二、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的吐蕃人文社会

据笔者初步的搜集和鉴别，阿拉伯、波斯文献中的吐蕃史料比较零散，但又弥足珍贵，它从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记载了吐蕃的情况，可补藏、汉文史料之不足。以下分类介绍 8 至 16 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记载的吐蕃社会与文化。

（一）可汗

《道里邦国志》在“各地诸王的称号”一节中说，“突厥、吐蕃、可萨突厥诸国的君主均被叫做罕甘（kh q n）^{[14] (P17)}。kh q n 亦译作可汗、合罕、可寒，属突厥语音译，意为皇帝、君主。吐蕃君主在藏语中称“赞普”（btsan po），但在与阿拉伯、波斯、突厥诸国的交往中，也被对方使臣、公文等称为可汗。如拉达克德兰茨村粟特石刻铭文，就把吐蕃赞普称为“可汗”（khagan）。这条史料它反映了 9 世纪上半叶吐蕃与中亚康国交使的情况，亦间接表明中亚及突厥等国是以自己国君的称号去称呼吐蕃赞普的。

关于吐蕃赞普的出身，阿拉伯、波斯文献也有记载。《世界境域志》：“其王称为吐蕃可汗，拥有大量军队和武器。……该地（n.zvan）有一部落，名叫玛域（mayul），吐蕃诸王皆出自此部。”

而《黄金草原》对吐蕃赞普的出身与称号另有一套说法：诺亚的重孙阿穆尔的后裔散居各地，其中一支来到印度边界，“还有一支前往吐蕃定居，并从中选出了一位服从大可汗权力的国王。但是，自从这位国王停止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日起，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吐蕃居民便称其首领为可汗，以模仿古突厥国王，后者享有‘可汗中的可汗’之尊号。^{[15] (P114)} 他们的国王享有‘图伯尔’的尊号，这来自也门国王图伯尔的名字。后来，时代的变迁使希姆叶尔语消失了，从而用附近民族的语言取而代之，国王获得了‘可汗’的尊号。^{[15] (P203-205)} 显然，《黄金草原》关于吐蕃赞普出生于诺亚的重孙阿穆尔的后裔，是一种受《圣经》文化影响的传说而已，不足以信。

（二）人民

《黄金草原》说：吐蕃“其居民大部分是由喜马

拉雅人组成的,……其中包括图伯尔(Tubba)人的后裔,也正如我们可以在《图伯尔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吐蕃人中,一部分是定居者,其余是游牧民。后者起源于突厥人,其人数之多不可胜数,其他任何突厥部族都不能与他们相媲美”。

《黄金草原》还说,“有人说‘吐蕃’(Thubbat)一名系由于他们的定居(Thabata)而来的^{[15](P204-205)},是一个叫‘赛米尔’的人把希姆叶尔人留在了吐蕃和中国中原^{[15](P392)}。这种说法把吐蕃王族的祖先追溯到最初的阿拉伯人那里,显然缺乏根据,我们只能理解马苏第的记载可能是当时阿拉伯世界流传的吐蕃人来源的说法之一。

至于说到吐蕃的游牧民来源于突厥,马苏第的记载也没有可信性。而在有关这一问题上,显然亲自到过吐蕃的米儿咱·海答儿在《中亚蒙兀儿史》中的记载,更为可信,其曰:“图伯特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做玉耳巴(yul pa)意思是‘村落居民’;另一类叫姜巴(chamba),意思是‘沙漠居民’。不过,沙漠居民只限于图伯特的一个地区,他们这种游牧民有一些很奇特的生活习惯,为其他地方所罕见:第一,肉或其他食物完全生吃,根本不知道烹调。其次,他们用肉而不用谷类喂马。他们只用羊驮运,每头大约能运载十二标准‘曼’。……姜巴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如下:冬季他们带着中国货盐铁、山羊毛衣料、裁术、牦牛、金子和围巾等藏货下到前述各山的西坡和南坡,也就是到达痕都斯坦并在该地进行贸易;到了春季他们又在那里带着当地出产的布匹、粮食、大米、谷类等,装在羊身上,满载而归。……乡村中的居民叫玉耳巴 yul pa,这种人散居在各地,例如退摆特的巴尔提地区就有;巴尔提本身包括若干〔较小的〕地段,如布里克、哈普拉、阿希加尔、阿斯喀尔都、〔隆克〕和拉达克等地,每一地段又都有堡垒和村落。^{[16](P375-379)}英译者注释道:“‘玉耳巴’可能是 yul cho pa 的简称,导源于 yul cho 或 yul che,意思是‘村落’。姜巴,据作者说,是位于帐篷中的人,即吐蕃的游牧民族。但沃德尔博士告诉我,‘玉耳巴’一般指‘土著’而言。^{[16](P375)}

(三) 社会与习俗

《地名辞典》:“随后我们到了吐蕃 tūb t) 部落,……整个部落向巴格拉吉王交纳赋税,〔吐蕃部落〕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其国王人选。那里有一座监狱,专门用于惩处罪犯和罚款。^{[17](P238)}这里说的“巴格拉吉王”,很可能是指当时吐蕃西部的拉达克王“拉吉”(lhargyal)^{[18](P44)}。至于说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其国王人选”,在藏汉史书中均不见记载,恐怕是一种误传。

《中国志》:“吐蕃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契丹的

山区。他们出自一个崇拜偶像的牧人种族,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把这些山区封赏给他们。^{[19](P331)}

《世界境域志》:“(rang rong)居民住在帐篷中,其财产为绵羊。吐蕃可汗向他们征收人头税以代地税。……该地 n.zvan) 有一部落,名叫玛域(mayul),吐蕃诸王皆出自此部。^{[20](P64)}关于“征收人头税以代地税”之说,有藏、汉文史料可作辅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称之为“大料集”,如“虎年(702年),……征孙波茹‘大料集’;”“鸡年(709年),……征调约茹牧户‘大料集’^{[19](P109-110)}。《新唐书·南蛮传》:“虞吐蕃法,每三户年出一兵,是谓大调集”,这种以户出兵的征调法,与人头税是相似的。

《道里邦国志》的作者谈到:“当一外国人到吐蕃,他会有一种愉快而幸福的感觉,直到其离开为止。^{[17](P49)}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对吐蕃人开朗的性格也有详细的记述:“那里居民总是笑咪咪、兴高采烈和心情欢畅的样子,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该王国中水果和鲜花之不可思议的品种,更谈不尽其牧场与河湖的所有财富。”^{[15](P204)}

(四) 宗教与寺庙

《道里邦国志》在“各地人民礼拜的方向”一节中说:“吐蕃(al-tuhbat)、突厥地、中国”等地的人民,都“面对玄石(伊斯兰教徒崇拜的圣物)礼拜。^{[17](P49)}这种说法显然是从伊斯兰礼拜的习俗出发的,如果它描述的是上述人群中的伊斯兰信仰者,方可信任。

在阿巴斯朝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813-833年在位),雅库比记载到:吐蕃赞普信仰了伊斯兰教,为了表示皈依,他还把用金宝座铸成的佛像送往呼罗珊。马蒙将这个偶像送往了麦加,但在一次叛乱中,叶基德总督用这座偶像打了金币。马蒙在位时期,是吐蕃赞普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的后两年和其子赤祖德赞执政(815-836年)的大部分时期,这两位赞普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说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可能是一种附会。也许赤祖德赞向黑衣大食送去一座金佛像,是弘扬佛教的一种举动。

《世界境域志》:“拉萨,是一个小镇,有许多偶像寺(佛寺?)和一个清真寺。其中住着少数的穆斯林。^{[20](P64)}结合此一记载,故有学者认为,佛教传入吐蕃的同时,南亚和中亚各国的其他宗教观念,也传到了吐蕃:通过突厥人(回鹘人)、粟特人传来了摩尼教,通过伊朗传来了景教,通过大食传来了伊斯兰教^{[22](P303-304)}。

《地名辞典》:“(吐蕃)这里有一座用高大芦苇〔筑成〕的城郭,城中有一寺庙,用石建筑,上有涂油之牛皮,寺庙里有用麝香、羚羊角作成的偶像。城中有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祆教徒和印度人。……吐蕃人祈祷时面朝麦加所在的方向。^{[17](P233)}前

文说过, 这里的“吐蕃”是指今拉达克, 如此, “用高大芦苇筑成的城郭”, “城中有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祆教徒和印度人”, 就可信了。

大约在 1341-1342 年, 穆罕默德·都忽鲁黑 (1320-1414 年为都忽鲁黑王朝时期), 于征伐喜马拉雅山的一些独立部落时, 劫掠了佛教寺庙。在此不久以前, 欧洲的旅行家鄂多立克曾说吐蕃沉睡在僧寺里面, 对于上述事件, 吐蕃并没有什么行动, 但是中国的皇帝派使节要求允许重建被毁的寺庙, 穆罕默德表示同意, 但是他提出条件, 依照可兰经典的法律, 要付与一定的贡赋^[23](P463)]。

《中亚蒙兀儿史》: “西藏是全契丹和图伯特的朝向和克尔白(圣地), 该地有一座巨大的偶像寺院。……他们中有学识的人(ulama)整个说来称为喇嘛。但是, 喇嘛根据学识的高下而有不同的名称。”接下来, 作者把他所了解到的佛教因果报应、六世轮回的教义叙述了一番, 然后说: “这就是释迦牟尼的教义。全中国都信奉这种宗教, 他们称此为释教; 而在图伯特则称为‘释迦土博(shakatu ba)’和‘释迦牟尼’。在史书上这字写作‘释迦牟尼’。在某些史书上, 释迦牟尼被认为是印度的圣者之一,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导师(hakim)。释教的教义还说, 仅仅入教信神是不能进入天堂的, 还要看他的业因如何。……目前, 他们一切偶像, 庙门口的主神像以及他们的全部传说, 都和他(迦叶佛 janakasapa)有关。佛像雕的是迦叶佛。他们将我们的穆圣所具有的许多优良品德都归之于迦叶佛。”^[16](P379, 387)]对照藏传佛教的教义、佛的名称、出家者的称号, 可知米儿咱·海答儿的描述大部分是符合实情的。

综上所述, 8-16 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关于吐蕃人文社会的记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特点:

第一, 自公元 8 世纪吐蕃与大食在中亚密切接触以来, 直到 14、15 世纪之交伊斯兰教正式传入吐蕃, 吐蕃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十分紧密, 其间出现的有关人物、事件频多, 层出不穷。

第二, 8-16 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有关吐蕃的记载十分丰富, 但我们在引用时需特别小心, 要进行鉴别, 因为数十作者中到过吐蕃的不过一二人, 其中米儿咱·海答儿所著《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较为可信。

第三, 8-16 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有关吐蕃的赞普、人民、社会、宗教、习俗等内容, 基本上符合史实, 与藏、汉文史籍的记载基本吻合; 但仍有个别说法属于误记或误传, 特别是关于吐蕃王族及人民来源的观点, 只能视为一种流行于阿拉伯世界的传说而已。

第四, 由于 8-16 世纪阿拉伯、波斯文献的作者大多具有伊斯兰文化的背景, 所以个别文献试图用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仪轨来说明吐蕃的宗教习俗, 这是需要特别加以鉴别的。

[注 释]

东噶·洛桑赤列撰. 东噶藏学大词典[M]: “古格第六代国王赤扎西巴德赞有三子即: 扎西则, 觉卧杰布, 沃巴则, 长子被突厥(噶逻速)杀死, 三子被突厥囚禁致死, 次子觉卧杰布继位。古格第 20 代国王和宗喀巴弟子古格堪钦阿旺扎巴同代, 这位堪钦著有《古格王朝政教史》, 有关古格 20 代国王的简况引自此书”。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494-496。

Haidar, muhammad, A History of the Moghols of Central Asia (Tarikh-i Rashidi), ed. & trans. by E. Elias & E. D. Ross, London, new impression, 1972. 译文引自: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M], 第二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 444-446。该书的英译者注释到, 根据各种资料综合来看, 米儿咱·海答儿在进军拉萨的途中最远点不可能超过帕努(Palgu 湖或 Palu), 那里的坐标大约是东经 86 度, 距离拉萨至少还有 350 英里左右。

王治来、周锡娟译. 世界地域志[M], 1983: 64。但世界地域志[M]的作者在这里说的应该不出古格王(Guge rgral po)统治阿里古格地区的范围。据东噶藏学大词典[M]: 朗达玛于铁鸡年(841 年)灭佛后, 全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木兔年(895 年)贝考赞(dpal vkhor btsan)王在江孜被奴隶起义者杀害, 长子基德尼玛贡和次子赤扎西则巴分别逃到阿里和拉堆(la stod)。基德尼玛贡的长子贝吉衮即统治芒隅拉达克(mar yul la dwags)即拉达克王朝。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494-496。

[参考文献]

- [1] 周传斌. 世界屋脊上的伊斯兰文化[J], 西北民族研究, 2002(4); 房建昌. 历史上穆斯林在西藏的活动[J], 穆斯林通讯, 2001(11); 陈波. 拉萨穆斯林群体调查[J], 西北民族研究, 2000(1); 段继业. 青藏高原地区藏族与穆斯林群体的互动关系[J], 民族研究, 2001(3); 索穷. 佛法圣地的伊斯兰文明——拉萨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记略[J], 西藏民俗(汉), 2002(4)。
 - [2] 劳费尔著、赵衍荪译. 藏语中的借词[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室印, 1981。
 - [3]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ibetan Empire in the West, M. Aris et Aung San Sua kyi (ed.),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Warminster, 1980。
 - [4] 宋) 司马光撰. 通鉴[M]. 卷 221, 玄宗开元三年。
 - [5] 宋) 司马光撰. 通鉴[M]. 卷 221, 玄宗开元五年。
 - [6]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ibetan Empire in the West.
 - [7] V. Minorsky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al- '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H. - 982 A.D.,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70。
- 王治来、周锡娟译. 世界地域志[M], 乌鲁木齐: 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 1983。 (下转 37 页)

了割据军阀抢占寺院,抗日战争、国共对峙等重大国内国际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刻意识到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主要依靠于一个强大团结的民族国家。他把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赤忱的忧国忧民意识和爱国精神。在西藏学法,抗战初期,他在重要法会上都不断用藏语向甘南藏区民众告知国内国际形势,不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广大藏族民众团结抗战。他曾经以这样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以佛教救世降魔之精神,辅弼国家,做到我中华民族,皆能安乐康宁,降伏危害人类和平之侵略者,共济大同佛域,一切灾祸,皆能消除,国民昌盛,教义弘扬为志愿。”^[1]

他还组织代表团,捐献购置飞机巨款,前往重庆支援抗战,用精神和物质援助,以实际行动鼓舞和激励前线军民的必胜信心和教育后方民众支援抗战。在大师的宣传和教育下,当拉卜楞寺发出筹集捐机款项的时候,民众蜂拥而至,卖羊卖牛,拿出自己应出的份额。据有关的记载,1943年,夏河县全县(包括夏河县、合作市全部及碌曲县、玛曲县部分)共有56788人。以全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国家捐献15.85元。(按当时的物价,每只羊的市场价格约为2元上下)^[2]大师的义举对稳定安多地区广大藏民、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和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世嘉木样丹贝坚参活佛身为宗教领袖,在思考宗教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点,寻求藏族文化传承新的文化载体,促进藏文化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伟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他的宗教思想和教育理念

思想光辉仍为现代许多宗教领袖所学习和思考。“他扮演了一个民族改革家的角色,为当时的宗教领袖人物们树立了典范,也为当今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们留下了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3]虽然大师英年早逝,但他在藏区尤其对安多藏区的发展史有着光辉的一笔。

[注 释]

1943年人口参见李永瑞(1942-1947年任夏河县长).《夏河县略志》。教区人口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档案馆藏的民国档案资料提供的概略数字。

[参考文献]

- [1]陈中义,洲塔.拉卜楞寺与黄氏家族[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
- [2]扎扎.嘉木样呼图克图世系[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
- [3]朱解琳.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 [4]李安宅.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 [5]李建国.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和民众意识近代化[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2).
- [6]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7]黄奋生.嘉木样、黄正清小传[M].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 [8]林跃勇.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对抗战战争的贡献[J].西藏研究,1999(2).

[审稿 孙 林]

[校对 梁成秀]

(上接23页)

- [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9]Geza Uray, 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cheism in the 8th-10th centuries, in: Ernst STEINKELINER and Helmut TAVSCHER (eds.),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83.
- [10][宋]王钦若、杨亿撰.册府元龟·将帅部[M].
- [11]Christopher I. Beckwith, Tibetan Empire in the West.
- [12]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 [13]Pallis, Marco, & Radhu, Abdul Wahid. Islam in Tibet and the Illustrated Narrative Tibetan Caravans, Islamic Texts Society, 1997; Fons Vitae, 1998.
- [14]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岷译注.道里邦国志[A].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5]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 [16]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汉译本)[M].乌鲁木齐:新

疆人民出版社,1983.

- [17]费瑯编、耿昇等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A].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8]群宗.拉达克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 [19]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0]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M].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年铅印本.
- [21]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岷译注.道里邦国志[M].中华书局,1991.
- [22]石泰安著、耿昇译.西藏的文明[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
- [23]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审稿 孙 林]

[校对 梁成秀]

Tibetan Society in the Islamic Cultural View

- - Tibetan Chronicle in Arabic and Persian Documents during 8th to 16th century

Yang Ming

(Museum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various records about Tibet (Tubo) in Arabic and Persian Documents during the 8th to 16th century, before which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had stepped into Tibet.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Documents about the Tibetan society are more creditable than that about the religious culture, reflecting the communic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of Islam and Tibet.

Key Words: Tibet; Islam; culture

Ekvall's Contributions to Early Tibetan Studies in U.S.A

Su Faxiang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and Soci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Robert. B. Ekvall is one of the earliest scholars of Tibet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is research on Tibet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important fields: anthropological study in Tibetan area, polity of Sakyas regime under Yuan dynasty and Tibetan opera. In particular, his anthropological study works of A'-mdo Tibetan area have been indispensable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arly history of Tibetan studies in America through introducing and commenting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ibetan studies by Mr. Robert. B. Ekvall.

Key Words: Robert. B. Ekvall, U.S.A, Tibetan studies, A'-mdo pastoral area, anthropology

On the History, Status Quo and Developing Tendency of Tibetan Buddhism Lamaseries in Tianzhu County

Hua Ruiji

(Gesar Institut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Located on the important line of communications, Tianzhu is a region populated with many minorities, where Tibetan Buddhism had been flourishing in the pas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history and the status quo of Tibetan Buddhism lamaseries in Tianzhu we present in this paper our opinions of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lamaserie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Tianzhu; Tibetan Buddhism; lamasery; history; status quo; developing tendency

Study on Tibetan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Himalayan Area

Zhou Jing & Li Tian

(Dept. of Architecture, School of Human Settlement & Civil Engineering,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Abstract: Tibetan Buddhist architecture, like monasteries and palaces are widely found across the Himalayan area where Tibetan Buddhism has profound influence, such as in Bhutan, Sikkim and Ladakh.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stribution Tibetan architecture types, the important monuments such as monasteries and palaces, and describ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malayan area; Tibetan Buddhist architecture; distribution; architecture type